学术专论

# 康熙南巡简拔举贡生监与御制文献的编纂及影响

郭康松　李明欣

[摘要]　康熙南巡，曾三次召试江南献诗的举贡生监，《大清会典事例》所列中选者73人中就有68人入京参与了御制文献的编纂，有效解决了御制文献编纂人才不足的问题。江南举贡生监参与修书后，形成了流程化的体系，翰林得以从繁杂的录选工作中解放出来，具体的编纂事务由举贡生监承担，提高了御制文献的编修效率。来自江南的举贡生监将江南的学术成果和理念纳入到御制文献中，使之成为康熙文治成果的一部分，提升了御制文献的学术水平。同时，这些举贡生监在编纂实践中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康熙的文学观念，在其日后担任乡试考官或知县时，皆能自觉地倡导、践行康熙诗教。

[关键词]　康熙南巡　御制文献　江南士子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6－0102－013

康熙中期，随着明遗民的凋零，江南士人逐渐从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转换的社会心理困境中走出。康熙数次南巡，也优待士林以化理人心，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和四十四年的三次南巡中，康熙增加了选拔地方人才的途径，通过考试赋诗、书法简拔江南举贡生监入京修书，其中取中的绝大多数参与了《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以下简称《御选四朝诗》）、《御选历代诗余》、《佩文韵府》、《御选唐诗》、《钦定词谱》等御制文献的编纂。[①]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康熙南巡间的召试，[②] 多侧重于制度与过程的考察，也论及康熙南巡期间献书、赐书等活动，探讨了南巡对江南地区文化系统的影响，却未讨论召试选拔出的江南人才与御制文献编纂的直接关系。本文参考了召试中选人数与身份考辨的成果，以江南举贡生监编修御制文献

[收稿日期]　2023-06-11

[作者简介]　郭康松（1964—　），男，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430062，1796517645@qq. com；李明欣（1996—　），女，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十堰442000，Mingxinlee@foxmail. 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御制文献与国家治理研究”（18BZS078）阶段性成果。

① 御制文献或由皇帝亲自撰著，或由皇帝敕令儒臣完成，能够鲜明地体现皇帝的执政意图和文化旨趣。

② 相关的研究成果有陈伟：《清代召试探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元强：《清代的召试》，《明清论丛》第十二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413-414页；霍聃：《康熙乾隆南巡召试研究——以苏杭召试士子群体为例》，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孟义昭：《康乾南巡中的江宁召试》，《历史档案》2021年第3期，第107-109页；何峰：《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教育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为中心，探究康熙如何利用举贡生监编纂御制文献、培养人才、推行文治。

## 一、康熙南巡简拔江南举贡生监

自康熙四十二年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历朝闺雅》《佩文韵府》等御制文献集中编纂，翰林几乎都身负修书之任，与此同时，翰林升转乏门，已壅滞成弊。早在编纂事务相对较少的康熙三十七年，左都御史吴涵就曾向康熙奏请扩大翰詹外转名额：“翰詹之储材日广，升转之壅滞宜疏，请变通以收实用。留馆之编修、检讨，每有历俸十余年而不得迁中允、赞善者，由中允迁侍讲、侍读等官，有历十余年而仅止五六品者。今编修、检讨五六十人，开坊而上约三十人，以七八十人而经年不遇一缺，不转一人。仰恳圣恩，酌复变通。”① 但由于御制文献编纂需要用人，对翰林外转控制得仍比较严格。在《历朝闺雅》编纂中的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查慎行《南斋日记》记载道：“少顷，又发下古今名媛诗，传谕云：‘汝等各有纂书之事，可交与掌院揆叙，选取二三首写成别本进呈。’” ② 由是可知南书房诸翰林也各有纂书任务，《历朝闺雅》只好由掌院纳兰揆叙主编。翰林的人才储备不能满足康熙编纂御制文献的需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开南巡简拔举人入内廷之先例，③ 长洲人吴廷桢即于此年以举人身份入职武英殿。《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载：“圣祖皇帝南巡，人士多献诗御览，上独奇山抡（引者注：吴廷桢，字山抡）作，拔第一，复乡举名，俾入直武英殿。”④ 沈德潜《古剑书屋诗钞序》亦载有召试事：“圣祖仁皇帝巡幸江南，先生献诗称旨，召试御舟，书《古剑篇》以赐。随命至京，侍世宗宪皇帝讲读，提擢翰林领袖，馆阁制草、碑文咸出先生手，纂修御制诸书。”⑤ 彭启丰《古剑书屋诗钞序》：“圣祖仁皇帝南巡，献诗称旨，擢第一，诏随驾至京师，以举人直南薰殿，旋成进士，入翰林，特命侍皇子讲读，纂修进御诸书。”⑥ 康熙这次简拔的初衷尚不在于缓解翰林修书的压力，而康熙四十二年多部大型御制文献开始集中编纂，选拔修书人才便成为康熙南巡简拔江南举贡生监的主要目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录了康熙四十二年和四十四年两次南巡召取江南举贡生监 73 人的籍贯和姓名，现有研究已考辨这两次南巡召试中选者可能不下 120 人，⑦ 相较于康熙三十八年的简拔，足以说明康熙在修书人才缺乏的压力下已然扩大了选拔规模。

康熙三次南巡简拔江南举贡生监，尤以康熙四十四年的情形被记录得最为详尽。是年三月，康熙在征调江浙两省在籍翰林到扬州编校《全唐诗》的同时，也筹备着召试江南举贡生监以缓解京城纂修人员不足的问题。十八日，康熙谕两江总督阿山等：“内廷供奉诸翰林，虽皆善书，但朕勤心典籍，卷帙繁多，见在供奉人员缮写不给。尔等出示传谕安徽、江苏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赴尔等衙门报名。至浙江，亦照此传谕。朕亲加考试。特谕。” ⑧ 康熙在《御制四朝诗选序》中记述了南巡过程中江南士人因献诗而得以选拔的状况：“朕夙兴夜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045《翰林院 · 官制》。

② 查慎行：《南斋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39-140 页。

③ 虽然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宋元强《清代的召试》中皆未列出康熙三十八年的这次召试，但中国人民大学陈伟和苏州大学霍聃的研究认为“清召试开始于康熙三十八年的南巡中”，本文取此说。

④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12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 149 册，明文书局，1985 年，第 25 页。

⑤ 沈德潜：《古剑书屋诗钞序》，吴廷桢：《古剑书屋诗钞》卷首。

⑥ 彭启丰：《古剑书屋诗钞序》，吴廷桢：《古剑书屋诗钞》卷首。

⑦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357《礼部 · 贡举（召试）》；霍聃：《康熙乾隆南巡召试研究——以苏杭召试士子群体为例》，第 44-49 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 219，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壬子。

寐，永图治安，念养士育才，国家盛典，考言询事，曩代良规，亦既试之制艺，使通经术，兼以论表判策，俾达古今。而于科目之外，时以诗赋取人，每当省方观民之会，士之所进诗赋、古文，止辇受观，停舟延问，亲试而拔其尤者亦多矣。”① 康熙驻跸苏州时“举贡监生员并献册页，童生人等共千名”；② 驻跸江宁时“上江各府贡监生童名士人等，赴行宫进献诗赋册页……传旨：这进献册页人等，江宁巡抚查明具奏”。③ 四月十二日，江苏巡抚宋荦进呈《江左十五子诗》，向康熙举荐吴士玉、顾嗣立、张大受等士人，其奏折云：“窃臣奉命抚吴，向与所部文士扬抡风雅，后先识拔共得十有五人。臣将其平日所著诗篇汇为一集，名曰《江左十五子诗》。此十五人内，王式丹、吴廷桢、徐昂发、钱名世、蒋廷锡业蒙皇上擢居翰林，徐永宣已中进士，今在籍候补，杨枪已经除授知县。李必恒久患耳聋，臣不敢轻荐外，所有吴士玉、顾嗣立、宫鸿历、郭元釪、张大受、王图炳、缪沅七人，久业铅椠，才学素优，惟缪沅远馆京师，王图炳偶尔患病，其吴士玉等见俱进有册页，奉旨考试，诚千载一时之嘉会。臣谨特举所知，恭候圣明采择，谨将十五子诗集一并恭呈睿览，合具奏闻。”④ 宋荦举荐的顾嗣立、张大受、宫鸿历、吴士玉、郭元釪五人皆参与了四月十五日苏州行宫的召试。⑤

康熙在江南的召试主要考察赋诗和书法。四月初五日杭州召试，康熙令作试帖诗一首，系“赋得御制芳辰麦陇布风和”，“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考试浙江举贡生监等诗字，会同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阅卷呈览，以顾祖雍、顾宁远二人记名”。⑥ 四月十五日苏州召试，康熙亲定诗题，要求读《御制幸云栖诗》并赋七言律诗一首，“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考试苏州等府举贡生监等诗字，会同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阅卷呈览，以汪泰来等五十三人记名”。⑦ 四月二十四日江宁召试，康熙先作御制诗一首，令应试的士人和二首，“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考试江宁等府举贡生监等诗字，会同大学士陈廷敬阅卷呈览，以钱荣世等五人记名”。⑧ 其中不善作诗者可以楷书抄录御制诗进呈，参与书法考试，范圣文等即因书法精美被选中。按照《实录》所载，杭州、苏州、江宁的三次召试共记名 60 人，而《大清会典事例》和《江南通志》等文献所载的名单不止 60 人，应当是将康熙四十二年江南召试的人数亦算在内，而且仍然可能有遗漏。

以《大清会典事例》所列召试中选名单，对照康熙御制文献所列职名表，73 名中选举贡生监中有 68 人参与了御制文献的编纂，占比 93%，这意味着康熙在江南召试的士人绝大多数都入京参编了御制文献。钱元台、秦培、王维淮、王维汉、吴学礼、王时鸿、杨祖楫、杜诏、储在文、吴元丰、邬维新、于树范、于枋、杨湝、余楷、吴襄参与了《御选历代诗余》（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编录；潘葆光、周鼎、钱阿瑛、许懋德、张位、赵侗敩、张弘敏、张育徽、邱起元、方觐、吴从龙、李同声、沈璲参与了《广群芳谱》（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校录；丁图南、董永朝、陆淹、顾嗣立、沈经、吴士玉、郑韵、潘秉钧、陈王谟、钱荣世、庄楷、刘上驷、范圣文、沈寅、田广运、高位、张大受、江弘文、邹弘志、谈汝龙、汪泰来参与了《御选四朝诗》（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录选；丁图南、沈经、钱阿瑛、汪俊、吴士玉、潘秉钧、孙顺、王齮、冯守礼、陆箕永、杨希曾、于树范、于枋、张育徽、李同声、洪声、田广运、宫懋谅、周旋、高位、

---

① 玄烨：《御制四朝诗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37 册，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2 页。

② 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初集 ·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46 册，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57 页。

③ 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初集 ·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46 册，第 69 页。

④ 宋荦：《西陂类稿》卷 37《荐士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42 页。

⑤《闾邱先生自订年谱》亦有记载，详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80 页。

⑥ 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初集 ·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46 册，第 49 页；《清圣祖实录》卷 219，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戊辰。

⑦《清圣祖实录》卷 219，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戊寅。

⑧《清圣祖实录》卷 219，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丁亥。

王敬铭参与了《佩文韵府》（成书于康熙五十年）校录；沈经、吴士玉、邹元斗、潘秉钧、高不骞、徐球、张果浚、杨士徽、杨开沅、郭元釪、宫鸿历、周旋、吴廷桢、顾祖雍参与了《御选唐诗》（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纂注；钱元台、郑韵、秦培、吴景果、王时鸿、杨祖楫、杜诏、储在文、邬维新、杨湝、沈寅、吴襄参与了《钦定词谱》（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分纂；顾嗣立、沈经、高不骞、杨士徽、杨开沅、郭元釪、宫鸿历、田广运、周旋、汪泰来等参与了《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成书时间不详，不晚于康熙五十七年）[1]纂录；钱阿瑛、吴士玉、邹元斗、杨湝、郭元釪参与了《骈字类编》（康熙五十八年开始编辑，雍正四年成书）纂修；钱阿瑛、吴士玉、邹元斗、吴襄参与了《子史精华》（康熙六十年敕修，雍正五年成书）修撰。

## 二、举贡生监提高了御制文献的编修效率

江南举贡生监加入御制文献的编纂之后，康熙开馆修书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顾嗣立在奉命编纂《御选四朝诗》时，曾作诗句“卷列四朝诗作史，地分三馆德为邻（是日，《历代诗余》《广群芳谱》二馆亦同宣旨）”感叹三馆修书之盛况。[2]《闾邱先生自订年谱》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 （十月）十二日内侍李玉传旨，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命翰林吴昺、陈至言、陈璋、魏学诚纂选，其南边考取举贡生童人等已到者十三人（顾嗣立、钱荣世、田广运、邹弘志、丁图南、江弘文、庄楷、陈王谟、董永、高位、谈汝龙、陆淹、顾沈经），未到者九人（张大受、吴士玉、汪泰来、潘秉钧、沈寅、钱金声、刘上驷、郑韵、范圣文）。[3]录选各翰林令在家纂选，书陆续送南书房启奏。次日入朝，进午门，起居注馆宣旨与《广群芳谱》《历代诗余》同日被命。先是武英殿开局纂辑《佩文韵府》，派钦取王敬铭等八人抄写。五月又于南薰殿开局编纂《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派杨开沅等十二人纂录。至是三馆俱令在外开局。庶吉士王景曾自请修书效力，上命入四朝诗馆，设局怡园，自十二月一日始。[4]

顾嗣立于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应诏北发，十月抵阙，十月十二日李玉传旨时还有数位举贡生监未抵京。在康熙南巡召试中入选的举贡生监抵京后被分配到《广群芳谱》《历代诗余》《佩文韵府》《钦定方舆路程考略》等诸馆修书，迟到者均分配到四朝诗馆，十二月一日起正式开编。

这些有江南举贡生监参与的修书局皆形成了流程化的修书体系，由翰林担任编校官总领大局，由举贡生监担任校录官承担具体的编录任务，如此将翰林从繁杂的具体工作中解放出来，翰林可在家纂选再送南书房启奏，同时可处理其余公务。如奉命纂选《御选四朝诗》的翰林魏学诚、吴昺、陈至言等人于开编不久的康熙四十五年二月还奉命出任了会试同考官，编纂的任务便交付给了以顾嗣立为首的举贡生监。顾嗣立在承旨后作诗云：“四部纷纶群玉堆，编摩首命并兰台（奉旨以嗣立领四朝诗馆之首）。似怜诗是臣家事，特地恩从天上来。伪体别裁回格律，残编采掇拂尘埃。英华文苑犹能续，滴露研朱意未灰。”[5]他在感念为皇帝修书之恩的同时点出其被命领四朝诗馆事，又有诗云“词章结习是前因，碌碌甘随十九人（同馆被命者共二十八，故云）”，进一步指出《御选四朝诗》其他校录官皆由他统领。顾嗣立也得到了与编翰林的信任：

> 总裁吴颖山（昺）、陈芝泉、陈钟庭（璋）诸先生皆以余夙负诗名，每事虚心下问，其发凡

---

① 《钦定方舆路程考略》又名《皇舆全览》，雍正《大清会典》载康熙五十七年“议准修成《皇舆全览》人员”之例，故康熙五十七年时《钦定方舆路程考略》已确定完成。参考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雍正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七辑，文海出版社，1994年，第259–260页。

② 余来明、潘金英校点：《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4页。

③ 与四库本《御选宋诗》开列职名表相校，“董永”应为“董永朝”，“顾沈经”中“顾”字为衍文，应为“沈经”。

④ 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第80–81页。

⑤ 余来明、潘金英校点：《翰林掌故五种》，第834页。

起例、分门别类编纂之事，悉以相委。余亦晨入暮归，摊书满案，丹黄甲乙，寒暑不暇，于同事诸公才长者进之，不及者容之，故皆谅余朴诚，同心并力，交好无间。①

制定凡例、分类等统筹事宜本应是吴昺、魏学诚、陈至言、陈璋、王景曾这些翰林纂选官的工作，他们与录选官领袖顾嗣立商量确定后，由顾嗣立带领怡园的举贡生监完成录选工作，再交付给翰林纂选官，所以以顾嗣立为代表的录选官才是《御选四朝诗》的实际编纂者，甚至掌局翰林的调任也未曾影响编纂进程。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总裁吴侍讲颖山奉命视学楚中”，十二月二十一日“张庶子寄亭（豫章）奉命至四朝诗馆”。② 由于吴昺于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任湖广学政离开京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张豫章正式接替外任的吴昺成为《御选四朝诗》编纂工作的总负责人，直至《御选四朝诗》刊印进呈结束，其后成为《御选四朝诗》卷首所列纂选官人员的首位。在张豫章接任四个月后，《御选四朝诗》的初稿即告成，由此可证由翰林与举贡生监共同合作的修书模式是成熟的体系，翰林因品衔较高只需要负责组织制定凡例、分配校录内容、督促工作进度、验收工作成果，举贡生监担任实际编纂者既可以保证工作质量，也能够提升编辑效率。

《御选历代诗余》及《钦定词谱》的编纂模式与《御选四朝诗》类似。《御选历代诗余》的纂修官王奕清“在词的创作方面无甚作品流传，可见并不擅长此道，虽则是几部大型词曲官书的负责人，恐怕实际上也很少亲任其事，不过品衔较高，遂居主要编者之位。阎锡爵和余正健的情况也与之类似”③。《御选历代诗余》正是由举贡生监于康熙四十六年分纂而成。楼俨在《云川阁集词序》中回忆了与杜诏同修《钦定词谱》的情况：“杜吉士云川诏于制艺、古文及古近体诗无不擅场，独以填词受知先帝。自康熙乙酉应召入都，即命修《历代词》。至己丑《词谱》之役，内直诸先生交荐之。俨以孙学士松坪师荐，因与云川奉命同修《词谱》，领其事者为泽州、京江两师相，时中允王公奕清、庶子阎公锡爵、司成余公正健为总裁。同馆则今吴学士襄、储编修在文、王编修时鸿、杨检讨湝、杨编修祖楫、吴怀柔景杲暨云川，与俨共八人。诸君子皆高才宿学，而云川尤于词研精深造，有独得焉者。始开局于莲花湾，继同寓枣香书屋。相与寻宫数调，靡间朝夕。”④《钦定词谱》由陈廷敬、张玉书两位大学士领事，王奕清、阎锡爵、余正健三位翰林为总裁，楼俨、杜诏等八位举贡生监为实际分纂。

除了内容编修，缮写样本也是举贡生监的重要工作。查慎行在《武英书局报竣奏折》中汇报了举贡生监缮写《佩文韵府》的工作情况：

其缮写人员，先经致弥在殿时，有郑为龙、李同声、王懋讷、宫懋谅、逯选、陆箕永、冯守礼、王敬铭、汪俊、洪昇、王錡、杨希曾十二人。去年四月，现在殿中校录者，有李同声、王懋讷、宫懋谅、陆箕永、冯守礼、王敬铭、汪俊、洪昇八人。五月以后，由《书画谱》发下者，有王世绳、顾蔼吉、裘严生、孙起范、吴暄、蒋深六人；由方舆馆取入者，有胡期恒、丛润、田广运、沈经、周旋五人；由子史精华馆取入者，有钱于树、范于枋、张育徽、潘秉钧、高位、钱阿瑛、丁图南、胡宸基八人；由孙致弥奏明发下者，有孙农祥、程瓒二人。又续下孙顺一人。诸臣皆感荷皇上高厚之恩，钦取在殿办事，且优给月俸、住房、衣服，一视内官学教习之例，各怀向荣之心，同矢报答之愿，上紧校录，不敢懈怠。⑤

由康熙五十年十月初十查慎行又写了《武英书局报竣回奏折》，可以确定上述奏报的具体日期是康熙五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所纂各韵俱已告竣”、举贡生监正在克日缮写之时。《佩文韵府》由

① 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第 82 页。

② 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第 84 页。

③ 江合友：《明清词谱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42 页。

④ 楼俨：《云川阁集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 1 册，凤凰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00-401 页。

⑤ 查慎行：《武英书局报竣奏折》，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 11 册，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 34-35 页。引文中“钱于树、范于枋”应为“于树范、于枋”，“钱”字应为衍文；“洪昇”或为“洪声”。

查慎行、钱名世、汪灏等翰林分纂而成，其后选用各修书馆“写好字者”缮写，有从《御定佩文斋书画谱》《钦定方舆路程考》《子史精华》等修书馆而来的校录人员陆续加入。康熙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李国屏的奏折反映了举贡生监修书的情状：“纂修《佩文韵府》处举人宫懋谅、胡期恒，贡生顾蔼吉、田广运，监生王敬铭、潘秉钧、于树范、洪声，纂修《方舆路程考略》处监生王增吉等各以自力不能维持，请照前修书人之例，供给钱粮、房屋、衣服等因呈文。遂问钱名世、王浩、查慎行及吴廷桢等，言宫懋谅等皆贫，不能自理是实等语。所有九人呈文三道，一并谨奏……朱批：彼等所呈之事，着尔与内总管大臣等会议具奏。”① 康熙五十年《佩文韵府》告竣时，查慎行言“钦取在殿办事，且优给月俸、住房、衣服，一视内官学教习之例”，② 可知举贡生监在京修书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他们克日分写，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便将《佩文韵府》缮写完成。

《御选唐诗》由已在京考取进士的举贡生监吴士玉、杨开沅、宫鸿历、杨士徽等为纂注官，他们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七日至四月三十日间注释并抄录后交给总阅官陈廷敬，陈廷敬将书稿与奏折交给监造官和素、王道化等人，再由和素奏呈给康熙，每隔三日左右奏呈一次，每次四篇左右。四月二十七日后康熙开始审定《御选唐诗》底稿，约每隔五日审定四五篇，或每隔数十日审定十余篇，由陈邦彦、顾祖雍、王图炳、王曾期分别缮写，待康熙修改定稿后再缮写刊刻。除顾祖雍一直为缮写官外，潘秉均等其余举贡生监只承担了校录工作。③

部分与修举贡生监参与了多部御制文献的编纂。《御选四朝诗》纂成后，顾嗣立与汪泰来参与分纂陈邦彦负责的《四川方舆路程考略》，郑韵和沈寅被调去分纂《钦定词谱》。④《钦定词谱》的分纂人员几乎就是《御选历代诗余》的编录人员，除了以词闻名的楼俨是于康熙四十八年专门奉诏参修以外，其余举贡生监皆是由江南召试而来。《御选历代诗余》于康熙四十六年分纂完成后，康熙又敕修《钦定词谱》，除于树范、于枋、俞楷、王维淮、吴元丰、王维汉、吴学礼离开，其余编录人员又在《御选历代诗余》的文献基础上编纂了《钦定词谱》，至康熙五十四年完成。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三十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奏“校完《佩文韵府》抽暇返回之监生潘秉均，情愿于《御选唐诗》修书处效力，其呈请转奏之汉文折一”，⑤ 和素未核实潘秉均修书出力实情便为之转奏请旨与修《御选唐诗》令康熙帝大为恼火，在详查潘秉均之呈文及其复归缘由后，康熙帝准其参编《御选唐诗》。由是可知，举贡生监的考勤皆记录在案以备查证，编纂人员调任其他书馆都需要康熙帝降旨。

## 三、举贡生监提升了御制文献的学术水平

康熙帝在江南召试的举贡生监是《御选四朝诗》《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的实际编纂者，而清初文学的发展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清初的周铭说：“词学之盛，莫逾今日，而今日之以词著，半萃东南。”⑥ 蒋景祁于康熙二十六年辑成的《瑶华集》能够大致展现清初词坛的面

① 《李国屏进书并贡生等呈请供给钱粮等折》，康熙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622 页。

② 查慎行：《武英书局报竣奏折》，《查慎行全集》第 11 册，第 35 页。

③ 内容参见武英殿总监造和素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至五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关于《御选唐诗》编纂的奏折五十余篇，《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765–893 页。

④ 《御选四朝诗》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进呈御览，康熙称善以后，六月初怡园的举贡生监便可参与其他编纂活动中去了。据江合友的研究，《钦定词谱》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编纂，那么与郑韵、沈寅被调往编纂《钦定词谱》的时间刚好相合。见《明清词谱史》，第 144 页。

⑤ 《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转奏汉折等情形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790 页。

⑥ 顾有孝：《松陵绝妙词选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17 页。

貌，所选江浙一带的词人占绝大多数。据李睿统计，清代词选的编纂者也多为江浙人。足见江浙词学之盛。[①]清初的江南也是各种诗学观念萌生和变革的地方，叶燮在《三径草序》中言："吾吴自国初以来，称诗之家如林……盖尝溯有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②]自江南入京修书的举贡生监正是在这样的诗学、词学勃发的风土中成长起来，他们的诗词观念长期受到江南风潮的濡染，他们的学识储备在藏书丰富的环境中积淀，他们拥有的江南文化特质能够自然地展现在其所纂辑的御制文献中，成为官方话语的一部分。

顾嗣立作为《御选四朝诗》的实际"操盘手"，早在康熙三十八年时便已向康熙进献了《元百家诗》，其年谱载："因进《元百家诗》九卷，奏曰：此是元朝一代之诗，向无刻本，臣以甲乙次序分编，留心数年始得成书。复进《韩愈诗集注》十一卷，奏曰：此集悉照李汉所编，后以集外诗附焉。上心甚悦，手加翻阅，命十三皇子将所进书一一留览。"[③]顾嗣立受吴廷桢举荐，获得康熙召见，其当面呈进的诗集一定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顾嗣立能够奉旨领江南召试而来的举贡生监编选四朝诗，不仅在于他能够提供《御选四朝诗》之《御选元诗》的文献基础和编纂经验，更在于他对于宋、金、元、明诗歌的研究足以代表江南诗坛的水平，且在诗坛的影响力足够广泛。

顾嗣立曾在《寒厅诗话》中概述了其学诗历程："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尝浪游南北，遍访名儒故老。闲居小圃，辄与当代名流往还，侧闻前辈长者之绪论。诗盟酒社，裒益不少，荏苒二十年矣。"[④]他的诗风也深受宋、金、元诗影响，《清诗别裁集》评其诗曰："诗品初仿金、元，继跻昌黎，后臻王、孟、韦、柳，垂老以未能步趋李、杜为憾。盖其诗得江山之助，游历愈广，风格愈上。"[⑤]顾嗣立与王士禛、宋荦、朱彝尊、叶燮、查慎行等诗坛名家交流频繁，诗学皆有由宋入唐的倾向，这种诗学历程与钱谦益倡导宋、元诗后清初诗坛的整体风尚是一致的。康熙二十六年李来章《观澜亭诗序》曰："今天下之诗喜为宋，渐且为元。"[⑥]康熙三十二年顾嗣立编成《元百家诗》，元诗正为盛行，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载："前后七子喜道涪州、遗山之诗，海内寻声者争言宋、元，炫异吊诡，无所不至，一时风靡。"[⑦]顾嗣立在元诗备受关注的氛围中，遍览文点、金侃家藏元人文集，又从传是楼、培林堂、含经楼及其他东南故家借阅元集百余种，在俞玚、金侃等朋友的帮助下抄选元诗，并为每位诗人撰写小传。初集告成后，顾嗣立又继续访求，借抄朱彝尊所藏元人小集，在康熙四十一年编成《元诗选》二集。在《御选四朝诗》开编前，顾嗣立穷尽江南资源已编成《元诗选》。王士禛评价云："门人顾嗣立，字侠君，汇选《元诗集》，自元好问迄张雨辈，起甲终癸，凡百家，与石门吴之振孟举《宋诗钞》并行，两朝之诗略具二书矣。其传例仿虞山之《列朝诗》，甚有雅裁。"[⑧]梁章钜也给予《元诗选》高度评价："元诗以顾侠君《元诗选》为善本，明诗以朱竹垞《明诗综》为善本。顾本前具小传，朱本前缀诗话，网罗繁富，议论平正。两代之诗，以此两本为巨观，他本可束之高阁矣。"[⑨]

---

① 李睿：《清代词选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9 页。

② 叶燮：《已畦集》卷 9《三径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4 册，第 420 页。

③《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第 74 页。

④ 顾嗣立：《寒厅诗话》，《丛书集成续编》第 201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年，第 273 页。

⑤ 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916 页。

⑥ 李来章：《礼山园文集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88 册，第 529 页。

⑦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049 页。

⑧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06 页。

⑨ 梁章钜：《退庵随笔》，《清诗话续编》第 4 册，第 1877 页。

来自江南的举贡生监将江南诗学的最新成果带入以《御选四朝诗》为代表的御制文献的编纂中。康熙在《御选历代诗余序》中夸赞御制诗总集曰："欲萃诗学之富，而有《全唐诗》刊本、《宋金元明四代诗选》。"①《御选四朝诗》得以"萃诗学之富"，与顾嗣立等编者具备存一代之文献的意识有关，《元诗选凡例》有言："自宋以后，刻本盛行，易于流布，连篇累牍，工拙并陈，其势必出于选而后可传。"② 顾嗣立入京编纂御制文献，使他得以窥见内府秘本，"乙酉秋，应诏入都，编选四朝诗馆。因得尽窥内府秘本，手自抄撮，存诸行箧"，③ 内府的藏书将"网罗繁富"的特点进一步放大，使《御选四朝诗》达到了"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④ 的编选目的。

江南举贡生监编录而成的《御选历代诗余》作为第一部官方词选，同样具备"网罗宏富"的特征。《四库全书总目》评道："凡柳、周婉丽之音，苏、辛奇恣之格，兼收两派，不主一隅。旁及元人小令，渐变繁声，明代新腔，不因旧谱者，苟一长可取，亦众美胥收。至于考求爵里，可以为论世之资，辨证妍媸，可以为倚声之律者，网罗宏富，尤极精详。自有词选以来，可云集其大成矣。"⑤《御选历代诗余》内容浩瀚，在存词、存人外还附有大量词话于后，比《词综》收录的词学文献更广博。词学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官方认可，与清初词学之兴盛分不开，更因词学与江南文治直接相关。曾举博学鸿词、撰《词苑丛话》的江南吴江人徐轨为丁炜编订的《紫云词》作序曰："今天子首重乐章，凡于郊庙燕享诸大典，其奏乐有声之可倚者，必命词臣豫为厘定。今先生《紫云词》既已流传南北，异日或有如周美成之为大晟乐正者，间采《紫云》一曲，播诸管弦，含宫咀商，陈于清庙明堂之上，使天下知润色太平之有助也，不亦休哉！"⑥ 鼓吹治世之音的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也提出："大都欢愉之词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尔。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⑦ 词这一文体润色太平的政治价值被康熙看重，于是康熙在《御制历代诗余序》中阐发了词的教化功能："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遗音，而后人审声选调所由以缘起也。而要皆昉于诗，则其本末源流之故有可言者……夫诗之扬厉功德，铺陈政事，固无论矣。至于《桑中》《蔓草》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盖蕙茝可以比贤者，嘤鸣可以喻友生，苟读其词而引伸之，触类之，范其轶志，砥阙贞心，则是编之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若夫一唱三叹，谱入丝竹，清浊高下，无相夺伦，殆宇宙之元音具是。推此而沿流讨源，由词以溯之诗，由诗以溯之乐，即箫韶九成，其亦不外于本人心以求自然之声也夫。"⑧ 康熙将"诗余"的起点追溯至乐府，以诗学度词学，认为"思无邪"也是作词的标准。浙西词派的厉鹗曾言："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⑨ 顾贞观也认为诗词不甚相远："诗是君家事，虽谓君家之诗即君家之词，何不可者？……飙流所始，同祖风骚。诗在六朝曰绮靡，在三代以上曰温柔敦厚，此非词源之所自出者乎？自是而汉魏乐府，而楚辞，而《三百篇》，皆于词焉悟之，皆即于紫纶勉而进之矣。"⑩ 顾贞观认为诗词"同祖风骚"，那么"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也适用于词，词传承《诗》

---

① 玄烨：《御选历代诗余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1 册，第 2 页。
② 顾嗣立：《元诗选凡例》，《元诗选》初集上，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 页。
③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序》，《元诗选》三集，第 1 页。
④ 玄烨：《御制四朝诗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37 册，第 2 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 199，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825 页。
⑥ 徐轨：《紫云词序》，丁炜著、粘良图点校：《问山集三种》，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297 页。
⑦ 朱彝尊：《紫云词序》，丁炜著，粘良图点校：《问山集三种》，第 293 页。
⑧ 玄烨：《御制历代诗余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1 册，第 1–2 页。
⑨ 厉鹗：《群雅词集序》，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755 页。
⑩ 顾贞观：《云川阁集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 1 册，第 399 页。

的雅正传统从理论上为浙西词派宗法南宋姜夔论证了合理性，将词提高到可与诗比拟的地位。康熙的“思无邪”论词显然因袭了浙西词派的理论，他能够接纳并阐发远在江南形成的雅正词统，与朱彝尊及《御选历代诗余》的编者关系甚大。

浙江桐乡人汪森在《词综序》中梳理过朱彝尊所倡扬的“醇雅”统绪：“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① 这与康熙十四年庶吉士严沆在《古今词选序》中所谓周邦彦在北宋最为“醇雅”，南宋姜夔、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词人“皆自美成出”② 的词学取向非常一致，这意味着浙派词人在有意识地树立以周邦彦到姜夔、史达祖的雅正词统。雅正词统的建立符合清初的文治需要，姜夔开拓的以咏物为途径的“醇雅”体性显然被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江南文人特意选择过，朱彝尊的词论中也流露出鸣盛的意识：“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③ 严迪昌的研究也直指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这种‘淡化’沉淀心底深处的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无疑是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也符合时代演变的正常秩序。” ④

编选《御选历代诗余》的举贡生监全部来自江南，大多接受了浙西词派雅正词统的濡染。无锡监生杜诏就是著名的词人，早年师从严绳孙、顾贞观，晚年追随朱彝尊，《弹指词序》论及朱彝尊对其词学的影响：“予少好填词，每为吾师所矜许，后遇竹垞先生，复窃闻其绪论，乃摩挲白石、梅溪之间，词体为之稍变。”⑤ 杜诏作词水平很高，常为词坛称道，宋荦《云川阁集词题辞》评曰：“杜庶常紫纶，昔余抚吴时首拔士也。诗文绮丽，词尤妙绝一时，老友朱检讨竹垞尝盛称之。比供奉内廷，流声翰苑，词名藉然。” ⑥ 陈廷敬《云川阁集词序》详述了杜诏“以词受知”、纂修《御选历代诗余》之原委：

> 龙集四十又四年春，军驾南巡，三吴之士踊跃抃舞，作为诗歌，导扬盛美。无锡杜生诏以《迎銮词》进呈，天语称善。会驻跸苏州，召试多士，一时济济云集，拔其尤者，得五十人，生与焉。回銮之日，驾幸惠山，又进《梁溪望幸词》，复召见御舟，特赐绫诗一幅。已而被召来京师。一日，传生等八人入南书房，命写《御制金莲花赋》，各赋《纪恩诗》一首。生独进一词。生不善书，而词甚工，复拔置第一。旋命纂修《历代诗余》。告竣者三年，上有《词谱》之命，凡内直诸臣，皆首荐生名。于是人皆艳生之才，奇生之遇，生亦自幸以词受知，日夕究心词学。⑦

杜诏以词扬盛世元音，被康熙特拔纂修《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在编纂过程中，朱彝尊还向杜诏寄《玉田词》抄本，因此《御选历代诗余》所选张炎词很有可能参考了此本《玉田词》，姜夔词等内容也多有参考《词综》的痕迹。《御选历代诗余》的体例沿袭了朱彝尊《词综》批驳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词以臆见分小令、中调、长调之目的观点，“不分小令、中调、长调”，⑧ 江南的举贡生监将清初词坛最先锋的观点连同浙西词派的“雅正”观念反映在《御选历代诗余》中，由是自清初以来在江南形塑完成的雅正词统被官修词选涵摄为文治成就的一部分，官方认定格律精工、归于醇雅为作词标准，词学成为消弭遗民情绪，为盛世鸣盛的文学工具。

---

① 汪森：《词综序》，朱彝尊、汪森编，民辉校点：《词综》，岳麓书社，1995 年，第 1 页。

② 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2 页。

③ 朱彝尊：《敬惕堂词序》，陈乃乾辑：《清名家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年，第 72 页。

④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32-233 页。

⑤ 杜诏：《弹指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 1 册，第 287 页。

⑥ 宋荦：《云川阁集词题辞》，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 1 册，第 402 页。

⑦ 陈廷敬：《云川阁集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 1 册，第 399-400 页。

⑧《御选历代诗余 · 钦定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1 册，第 3 页。

为了便于向初学者指示门径，为词之创作设立规范，《钦定词谱》又在《御选历代诗余》的文献基础上全面整合了清初格律谱制作的发展成果。清初的江南词坛，创作及选辑繁荣，越来越多的词家关注词的格律形式，开始反思明代所制格律谱之不足，不断推进格律规范的研究，新制定的词谱被越来越多的江南词人遵守。阳羡词派的宜兴人万树《词律》将一切词学现象均置于字声格律的框架内做出解释，并对词谱的编纂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示范。康熙也肯定了格律谱对清初词体规范的贡献，没有以选代谱，而是在《御选历代诗余》之外再专门编纂《钦定词谱》，以弥补通行词谱因文献欠缺而收调规模不足的缺憾。康熙四十六年浦江监生楼俨向南巡的康熙献《清平乐》获钦取，受命与词人杜诏等江南举贡生监一同编修《钦定词谱》。楼俨对格律谱颇有研究，"浙江楼俨自京南还，在嘉兴见朱彝尊，彝尊授以沈璟旧纂曲谱，命为订正，俨因撰《书吴江沈氏九宫谱后》"。① 楼俨"以张綖之《诗余图谱》、程明善之《啸余谱》及毛先舒之《词学全书》，率皆谬妄错杂，倚声家无所遵循，因自订《群雅集》一书，以四声二十八调为经，而以词之有宫调者为纬，并以词之无宫调者，依世代为先后，附于其下。朱竹垞先生为之序。以卷帙繁重，未及开雕。今不可复得矣"。② 楼俨质疑张綖等词人以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排列词作，主张以宫调为标准排列词谱，若词作的宫调可考则以二十八调之序排列，若不可考则以时代顺序附于后。朱彝尊对此大加赞赏："以字之长短分调，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论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余以时代先后为次，斯世运升降，可以观焉。"③ 楼俨《群雅集》中反映出的制谱观念与《御选历代诗余》基本一致，只是在排列词调方面使用了宫调的序列。杜诏、楼俨等江南举贡生监编纂《钦定词谱》充分借鉴了江南已有词谱的制作思路，如沿用了张綖所创的圈法，以朱墨双色标识图谱；在排序方面，改良了万树"专叙字数"的做法；也继承了万树《词律》为特殊格律现象作注的处理方式。在江南词坛被反复研究的格律谱借《钦定词谱》为官方所认可，词谱之学在江南举贡生监的努力下正式被官学所涵括，成为康熙文治的成就之一。

## 四、举贡生监对康熙诗教的认同及践行

在举贡生监通过编修御制文献将江南的文学成就转化为康熙文治成果的同时，他们的编纂实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主张。顾嗣立负责编纂的《御选四朝诗》与其私修的《元诗选》相比，对"温柔敦厚"这一重要诗学观念的理解便有明显的不同。《元诗选凡例》云：

> 太史采诗，所以观风。学者诵诗，期于论世。诗之为用，非苟焉而已。故于诸家集中，凡有义关风化、事涉纪载者，在所亟收，亦乐天讽喻、少陵诗史之遗意也。至于风云月露之词，香草美人之喻，体兼比兴，用在劝惩，此选家之微尚，岂与气数为升降者乎？④

顾嗣立选元诗时留意"讽喻""劝惩"之诗，希望通过呈现"诗史"来体现选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发挥诗歌的教化作用。而《御选四朝诗》的选诗标准则完全服务于康熙本人所推崇的有利于统治的诗学思想，帝王所期许的诗教表现方式与士大夫诗人所积极展现的不尽相同。康熙在《御制四朝诗选序》中强调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盖举斯世而措之礼陶乐淑之中，被以温柔敦厚之教，故所以奖劝之者，靡弗至焉。"⑤ 四年后，康熙的《御选唐诗序》进一步阐发了"温柔敦厚"的内涵："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

---

① 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954 页。

② 江顺诒：《词学集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24 页。

③ 江顺诒：《词学集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3219 页。

④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上，第 8 页。

⑤ 玄烨：《御制四朝诗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37 册，第 2 页。

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① 康熙崇正抑变的态度与《元诗选》收诗重视“乐天讽喻、少陵诗史之遗意”不同，顾嗣立的“温柔敦厚”观是申涵光所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也”，② 更关注“温柔敦厚”的动机而非艺术表现，这种从本体意义上来理解诗教与江南通行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康熙所倡扬的“温柔敦厚”观是唐、宋通行的以政教为中心的诗教观，主张对统治者的怨刺应当温柔含蓄，这是为实现治世之音的文治目标而提出的诗学要求。

这些积极谋求仕宦的举贡生监深谙康熙对鸣盛的需要，他们在面对康熙时，自觉隐藏起对待前朝诗歌“愤而不失其正”的正变观，作诗皆迎合治世之音。顾嗣立苏州试诗所赋七言律诗有“小臣何幸瞻神笔，烂漫光华仰帝尧”③ 之句；《御选四朝诗》录选官丁图南和诗中有“君王游豫非无事，试听嵩呼祝颂虔”“天心爱物常施雨，帝德当阳自惕乾”“皇衷多少勤民意，千载诗篇想恪虔”等句；④《御选唐诗》纂注官吴廷桢在召试时也曾作出“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⑤ 的诗句。这些江南举贡生监在召试试卷中歌颂并塑造了康熙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帝王形象。在编纂御制文献的时候，他们需要认真揣摩康熙所主导的诗学话语，然后通过选诗等方式展现符合康熙文治意图的作品。康熙称《御选唐诗》的编纂是“命儒臣依次编注，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随谕改定”。⑥ 吴士玉、杨开沅、宫鸿历、杨士徽、高不骞、郭元釪作为纂注官，他们的每一句编注都经过了康熙的审定；举贡生监潘秉均、邹元斗、张果浚、沈经、周旋、徐球等在校录《御选唐诗》的过程中，通过频繁的校阅活动逐渐加深对“温柔敦厚”的经典诗作的印象，他们诗文创作时的规范意识不断地强化。

举贡生监参与的编纂实践又处于集中且活跃的文学场域中，他们不但需要就编纂内容和翰林交流诗文观点，有时也会一起酬唱。在《御选四朝诗》编选闲暇，顾嗣立参与过数次诗文酒会：

> 编纂之暇，与侯官林吉人（佶）、睢州李牟山（中）、襄城刘太乙（青藜）、大名成周卜（文昭）、大兴蒋静山、钱塘吴宝崖（陈炎）、桐城刘北固、盱眙李苍存（嶟端）、泰州缪湘芷、江都郭于宫（元釪）、武进庄书田（楷）、同郡张日容、十兄迂客、族弟撍玉之珽为文酒之会，饮如长鲸，酒酣耳热，狂歌间作，见者谓为风流人豪。
>
> 每逢花晨月夕，各出杖头，谶集怡园。赋诗饮酒，率以为常。是时商丘中丞内擢太宰来都，辄邀故旧数人，寓斋雅集，或携壶挈榼，至龙泉、圣安、崇效诸寺，樵沙道院、风氏园古松下，分韵赋诗。文酒之会、友朋之聚，未有盛于此时者也。⑦

这些来自江南的举贡生监在处理日常的编纂琐事时，脑中回旋着被康熙重新阐释的诗教观念，在与京城翰林的文艺交际中也自然而然受到京城诗学氛围的濡染，会不自觉地审视自己的诗学创作是否属于治世之音。康熙的文治观念与京城中仕宦的文学观念共同联动成了一股披靡的“风”，“当它如日中天之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完全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⑧ 举贡生监群体性地迎合康熙所主导的国家话语，甘愿成为朝廷的雅颂手，是当时思想环境下难以违抗的大势所趋。

---

① 玄烨：《御选唐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6 册，第 1–2 页。

② 申涵光：《聪山集》卷 2《贾黄公诗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0 册，第 91 页。

③ 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第 80 页。

④ 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初集 ·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第 72–73 页。

⑤《清史列传》第 9 册，《清代传记丛刊》第 104 册，第 835 页。

⑥ 玄烨：《御选唐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6 册，第 1 页。

⑦ 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89 册，第 82 页。

⑧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生活 · 读书 · 新知 · 三联书店，2020 年，第 144 页。

在修书之外，康熙还将这些举贡生监培养为推行文治的重要人物。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对修书举人予以关照，三月戊申“各馆修书举人落卷亦着查出，一并呈览”；三月壬子“赐举人王图炳等十七人一体殿试”。① 吴士玉、杨开沅、宫鸿历、钱荣世、储在文、方觐、李同声、张大受、杨士徽、杜诏、杨祖楫、顾嗣立、王时鸿、杨湝、陈王谟、吴襄、庄楷先后被选为庶吉士，在庶常馆内继续对诗文用功。依照顺治时期的《庶吉士进学规条》，“汉书诸士每月作课四篇，文二、诗二”，“务令馆师当面看作，即日交卷，呈馆师批改”；“每月赴内院考试”，“汉文诸士考文一篇、诗一首”。在馆师严格的教习下，已成为庶吉士的修书举贡生监“批改诗文必遵奉省改”，古文、诗赋俱“举法前代大家，务须典雅醇正，勿为险怪纤巧”，② 其诗文创作进一步受到康熙诗文观念的规训，追随唐音以鸣盛。康熙曾多次感慨修书翰林的诗文甚佳，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云：“翰林官员内多有不识字义、不能作诗文者，此皆教习不勤之故。比年以来，武英殿行走之人，乡会试中式者甚多，盖以在武英殿行走，每日不释卷耳。”③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亦云：“内廷行走及武英殿修书翰林亦较在外翰林不同，诗文皆大方，总由每日纂修、校对之故也。”④ 已成为翰林官的修书举贡生监有多种途径发挥自身的文教影响力，部分人被选为阅卷取士的学臣，王时鸿为山西乡试正考官，吴廷桢、王敬铭、吴士玉都担任过江西乡试正考官，杨士徽、张大受、庄楷都担任过四川乡试正考官；部分人被钦命为学政，代天子巡行教化，张大受提督贵州学政，吴士玉、吴襄都曾提督顺天学政，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吴士玉于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乙酉受命教习庶吉士，实现了从被规范者至诗风规训者地位的转变；杜诏为《清诗大雅》作序，赞扬其“持择唯谨，凡愤时嫉俗之作，噍杀粗厉、广贲流辟之音，悉置不录。揆厥大旨，总以温柔敦厚为归”，⑤ 通过自身的社交网络推行康熙所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

部分举贡生监修书六年后得以补官缺。⑥ 秦培任直隶顺德府巨鹿县知县，邬维新任广东广州府新宁县知县，吴景果任直隶顺天府怀柔县知县，沈寅任湖广荆州府公安县知县，王维淮任广西思恩府西林县知县，郑韵任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楼俨任广西桂林府灵川县知县。康熙五十七年王维淮任西林知县时编成《西林县志》，思恩知府陈九鹏所作序言表现出了强烈的盛世意识：

> 西林县治建自圣朝康熙四年，始隶思恩，距郡城千有余里，袤连邻界亦千有余里，非弹丸也……迩年来感沐我皇上仁德覃敷，蚩蚩者氓，蒸然向化，有于变之风，使无志以纪之，一旦輶轩下逮，将何采献焉！⑦

王维淮在内廷供奉数年后，于康熙五十四年由临桂改知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西林县，用宰邑三年的闲暇编刻县志。正如其自序曰：“而或者嘉淮之所为，不知淮重有慨也。西林自康熙六年始得流官治其事，前于淮者共十有五人，而卒于官者乃十有一。其任也，或以岁计，或以月计，瘴疠之促人如是，又谁暇从事笔墨营此不急之务？”⑧ 字里行间显现出王维淮作对地方文教事业强烈的使命感。王维淮有意识地整理了西林县建立以来的文字记载，涉及图考、风俗、田赋、文艺等十九目，成为康熙文治教化及于偏远地区的例证。

---

① 《清圣祖仁实录》卷 249，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戊申、壬子。

② 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05 页。

③ 《清圣祖仁实录》卷 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庚寅。

④ 《清圣祖仁实录》卷 262，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甲子。

⑤ 杜诏：《清诗大雅序》，《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21 页。

⑥ 雍正《大清会典》载有康熙朝议叙修成《佩文韵府》《皇舆全览》《骈字类编》举贡生监补知县缺例。详见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第 259–260 页。

⑦ 崔建英编：《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194 页。

⑧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方志提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29 页。

康熙南巡简拔的举贡生监是协助其施行文治的重要群体。作为康熙后期御制文献的主要编纂者，他们将江南的文化所长转化为清廷文治成果的一部分，也顺应了康熙的诗文观念，为士林纂辑了可供取法的充实资料。作为朝野间思想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他们在接受了康熙的选拔与培养后，成为了清廷的文化践行者、代言人。

（本文曾提交2023年5月在无锡举办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44届年会暨2023年无锡滨湖历史文献学术研讨会”，会上得到诸伟奇、徐道彬、沈志富等专家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 References

Meng Yizhao. “Kangqian nanxun zhongde jiangning zhaoshi” (The royal examination held in Jiangning during the southern tours of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3 (2021).

Shang Yanliu. *Qingdai keju kaoshi shulu* (Reference recorded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Gugong chubanshe, 2014.

Song Yuanqiang. “Qingdai de zhaoshi”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mperor’s calling for an interview in the Qing Dynasty). *Mingqing luncong*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2 (2012).

Wang Fansen. *Zhiniu de diyin* (Stubborn bas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2020.

Yan Dichang. *Qingcishi* (History of QingCi).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1.

Zhang Huijian. *Ming Qing Jiangsu wenren nianbiao* (Chronology of Jiangsu literat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 The Selection of Scholars on Kangxi’s Southern Tour and the Editing and Influence of Official Books

GUO Kangs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1796517645@qq. com)

LI Ming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ingxinlee@foxmail. com)

**Abstract:** Kangxi had three exams to recruit Jiangnan scholars during his southern inspection. Among the 73 candidates listed in *Collected Statutes, illustrations and Precedents of Qing Dynasty*, 68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books planned by Kangxi, which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ditors. After Jiangnan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editing activities, a process−oriented compilation system was formed, so that Hanlin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trivial matters of book compilation, and Jiangnan scholars undertook specific editing work, which improved editing efficiency. Jiangnan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work injected Jiangna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deas into official books, making it a part of Kangxi’s cultural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and improving the academic level of books planned by Kangxi. These Jiangnan scholars were also subtly influenced by Kangxi’s literary concepts in their compilation activities. When they became examiners or local administrators in the future, they were able to consciously advocate and practice Kangxi’s poetic teachings.

**Keywords:** Kangxi’s southern inspection, books planned by the emperor, Jiangnan scholars